

胡锡进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波黑战地采访手记



胡锡进 著

# 波黑战地采访手记

邵震泽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齐书深  
装帧设计：安玉滨 王向群

## 波黑战地采访手记

Bohei Zhandi Caifang Shouji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9 8/16 · 插页 2  
字数：220 000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

ISBN 7-207-03601-9/G · 653 定价：11.80 元

## 序 言

关于举世瞩目的波黑战争，人们过去几年从各种报刊上读到过大量有关的报道和评论。由于事态的错综复杂，历程的曲折多变，局外人只能得到一些模糊的印象和粗略的了解。如今这场战火虽然已经熄灭，但是余烬尚有微温，问题并未彻底解决，重温一下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还是很有意义的。《波黑战地采访手记》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

这本书是一位战地记者的手记。作者曾在前南斯拉夫工作整整三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各种困难，尝尽许多苦头，常年奔波在战火纷飞的波黑战场上，各处的废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差不多经历了波黑战争的全过程，看到过互相争夺寸土的交战场面，会见过许多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访问过大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各族难民。他写下的每个篇章，都是一些令人信服的忠实记录。

这不是一本战事通讯集，但是作者根据自己现场采访，用流畅而生动的笔调写出当时亲眼目睹的实况，娓娓道来，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并且讲出许多引人入胜的内幕真相和历史背景，使人读来兴趣盎然。

这不是一本国际问题的论著，但是作者结合着对所见所闻的描述，对事态进行剖析分析，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畅所欲言，议论

2024/06

风生。人们从书中可以了解到波黑悲剧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的是非曲直，尽管许多论断只是一家之言。

作为一本回忆录，它既有史实的记叙，又有感情的抒发，还广征博引，介绍不少民俗掌故，内容相当丰富多采。它使人们不仅能够获得许多有关波黑战争的宝贵资料，而且对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民族矛盾和纠纷，也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者还毫无保留地诉说自己在战乱频仍的异国他乡走南闯北的遭遇，让人深深体会到一个战地记者的甘苦与隐衷。

这本充满激情的著作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血，人们读过之后不难看出这位年轻记者的胆识和勤奋，以及他的才华。他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怀有高度的热情，能够不顾个人安危，不畏艰难险阻，竭尽全力出色地完成任务。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可多得的素质和敬业精神。

我想读者定会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译文稿

九九年十一月三日

# 写 在 前 面

1996年4月2日,我从贝尔格莱德开车绕道900公里,来到已被攻破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普列特维采(克罗地亚境内),终于看到了5年前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发生第一起冲突的地方。尽管原南斯拉夫战争正式爆发于1991年6月,但在许多人的眼里,1991年3月31日塞族人与克罗地亚警察在这里的那次冲突,是这场残酷战争的第一支序曲。

天下着大雪,一位当地克罗地亚人带我看了废墟,然后把我引进树林,在没膝的积雪中挖出一块低矮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着第一位克罗地亚殉难者约西普·约维奇的名字,还有一句克罗地亚人感谢这位年轻死者的话。普列特维采是原南斯拉夫的著名旅游区,中国外交官们习惯地称它“十六湖”。因为大雪阻住了前往湖边的路,也因为担心地雷,我没有看到据说相当美丽的湖区,只看到神话般银装素裹的层层山峦……

两个月以后的6月12日,我告别工作了3年多的前南斯拉夫,怀着复杂的感情,与妻子一同来到贝尔格莱德机场。3年前我取道布加勒斯特乘火车进入受到制裁的南斯拉夫时,贝尔格莱德机场完全关闭,候机楼前的广场只能看到荷枪实弹的巡逻士兵,没有一个旅客。如今人们纷纷来了,我却该走了。我该高兴,赶上了战争的热闹,走在“波黑”这个字眼渐渐被中国人淡忘之际,但曲终



图1 第一位克罗地亚殉难者的纪念碑。在许多人的眼里，战争就是从这里开始。

人散，正是人哎哎叹叹的时候。使馆的许多同志来送我，为我平添了伤感。我不知是舍不得这些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的朋友，舍不得原南斯拉夫，还是舍不下我留在了这块土地上的最后

青春。我来时33岁，踌躇满志；走时已是36岁，有了一点进入中年的恐慌。

人生的路不长，新闻的时过境迁，尤其给人以生命的仓促感。所以就想干点什么，就想人生变得激烈。

新闻大致需要两种人，一种是学者型的，人与文章都深沉而厚重；另一种是实践型的，善于遇事往前“冲”。举重若轻需要厚积而薄发，“冲”却只需勇气，加上点新闻的灵性。我没有学者的气质，所以只能做后一种，使劲极端。对波黑战争的报道，是继柬埔寨战争之后中国传媒对现代国际热点进行现场报道的第一次有规模的尝试，我算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极力选择波黑滚滚烫烫的时候去凑热闹。我力求报道的快、新鲜，当时看得过去，但没什么生命力，很少有能留下来的东西，能让我从原南斯拉夫带走的，只有一份中国记者的少有经历。我好冲动，性格中充满不安，并且相信，我在中国找到了一个可以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的职业——记者。想想看，在

机关或公司大楼里对着上司冲动一回是多么后患无穷；而冲动地穿越巴尔干的一条交火线，试图在全世界记者中率先进入一个苦难的城市，又是多么值得夸耀。

我很幸运，被派到原南斯拉夫这样的地方。渴望激烈，激烈的生活就真地找上门来。近年来，中国的读者和观众都对西方记者发自现代国际热点的血淋淋报道充满了崇拜。中国人通常不知道中国记者可能拿不到去索马里或是布隆迪的签证，不知道由于中国传媒的官方地位，中国记者即使去了车臣，也难有收获。换句话说，人们不了解中国驻外记者的种种苦衷，而只是对他们表面的堕性持尖刻的批评态度。一位好友曾怒冲冲地对我说：“大事一来，你们这些（中国）记者只会守在家里看电视，并且不敢坐在沙发上看，而是缩在床上，用被子把身子蒙起来，只掀开一个被角，露出小眼睛看那些西方记者拍出的画面。”而“瞧瞧人家西方记者”的赞叹，有时在北京公厕的茅坑里也能听到。中国记者就像一些没有嫁出去的处女，听到的却是“母鸡也能下个蛋”的诅咒，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女人，有时真想胡乱找个男人，生出个私孩子。

我就是这样赌气般地一次次往战区跑，狂妄地想在巴尔干的战区树起一面中国记者的旗帜。有时我做得很过分，自做多情。像那次去克拉伊纳寻找墓碑，对我的报道能有多大意义呢？美国商业部长布朗 1996 年 4 月坠机死在克罗地亚南部的杜布罗夫尼克，我在现场写出了稿子，但匆忙之中，又能写出多少中国读者感兴趣的东西呢？我在波黑写了不少通讯和现场特写，比如《最后通牒时限到来之前》、《空袭之后访帕莱》、《在离戈拉日代 3 公里处》、《断绝关系第一天》、《帕莱——战争中成名的小镇》，但大多因为篇幅所限，短得可怜，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也没有一篇挤进中国各种新闻奖。给人留下点印像的，恰恰是与战争报道无关的作品。我常想自己报道的路子可能错了，但这样想着，却舍不得从错误的路上走出

来。

我深深掉入理想主义中不能自拔。我发现，我在心底深处想的不是怎么写好报道，而是怎样让自己“像个记者”。幸亏两者之间不总是矛盾的。我太受不了蔑视，为自己，也为自己承受不起的那个概念——中国人。我抗着小米加步枪，却要到一场现代新闻战争中去做战士。我打不过西方记者，却为跟他们“打了”而沾沾自喜。我总是让自己从一些这样的小事上受到鼓舞。

1994年我回国休假时，去航天工业部508所买防弹背心。在这之前，我一直借用西方记者的防弹衣去波黑战地采访，有时根本就没有防弹衣。508所是北京城南航天城的一个机构，我是在那个名叫东高地的地方长大。一位50岁上下的男人接待了我，几天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妻子一定要见我。原来，那是个佛门信女，她为一个东高地的记者向他丈夫买防弹衣去波黑而骄傲，并且感动不已。见面的那天，她送了我一张她崇拜的佛门清海无上师的照片，让我随身带着她保佑自己的平安，她对我说：“孩子，你去吧，我会在远远地方为你烧香祝福。”也是那些日子，我去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修理用坏的电脑打印机，在一家专业商店里，师傅们看了机器，告诉我无法修。但当他们听说这部机器要带到战场上上去，态度立刻变了。他们请我坐下耐心等待，掏自己的钱为我买来饮料，帮助我向四处打电话，尽最后的努力……我感谢那杯水，感谢来自这些普通人的、黄土般纯朴的关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正是这样的关怀，给了我力量。我毫无疑问是小人物，影响不了周围的世界，我也不想“穷则独善其身”。我只是想做这样的人物，在波黑战场上，以我的生命之轻，托起我的生命之重。

回过头看上面的文字，觉着渲染的味道重了点。实际上，在波黑采访，并不像人们通常想像的那么危险。许多危险的感觉，是出

于中国读者、包括我们这些中国记者对战地采访的陌生。波黑不是一场正规战争，没有中国南征北战那样波澜壮阔的场面。即使北约的空袭，也决没有二次大战中那样的黑压压的机群。萨拉热窝地区有一个小山包，名叫“肥山”，被穆斯林军队占据，恰好俯瞰塞族的战略交通线。我当过兵，凭我的感觉，如果用一个连的兵力，给他们下死命令，在几个小时内完全可能拿下它。我问塞族人，为什么不做这样？他们的回答是：“穆斯林的火力太强了。”而真实情况是，穆斯林在波黑全境只有几百件重武器。记者在波黑面临的危险更多是潜在的：与冲突各方周旋，混乱，地雷。由于波黑都是山路，雪、雨、雾变化无常，开车的危险似乎更大些。有一个数字提供了波黑的危险座标：到战争结束前，联合国部队一共在波黑死了约 200 人，伤千人，一半以上死伤于车祸，占第二位的是触雷，其次才是被枪弹直接打死。我本人在波黑高速行驶时翻过一次车，幸好掉进去的沟不深，里面都是积雪，免于死伤。擦边的虚惊比较多，比如一次在结冰的路面上与联合国部队装甲车迎面相撞，但也很走运，撞在了装甲车的胶轮上。编辑部并不鼓励我开车去波黑，但如果要抢新闻时效，在波黑不开车是不行的。

我想说，中国记者在波黑的真正敌人是种种可以预见和无法预见的困难。最典型的是波黑战区的道路经常被冲突各方隔断，在整个原南地区也是一样。为了一个近距离采访，绕道数百公里是司空见惯的。1995 年 4 月底，为了在波黑全面停火协议结束前进入萨拉热窝，我开车 700 公里去萨格勒布（克罗地亚首都、联合国部队总部所在地），试图从那里搭乘联合国部队的飞机，绕过塞族的麻烦进入萨拉热窝机场。当时贝尔格莱德与萨格勒布之间连电话也不通，我到了萨格勒布以后才知道，维和部队的飞机已经停飞。原路返回，我又去波黑塞控区碰运气，到了萨拉热窝边上的帕莱小镇（塞族控制区“首都”），塞族对中国记者相当友好，但那次没有通

融。结果是，往返开车的距离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我到底没能在那个有新闻价值的关头进入萨拉热窝穆斯林控制区。

我发现，我对波黑的回忆许多是发生在路上的故事，而不是战场本身，这或许因为，我总是单独一人去波黑和巴尔干各地采访，路上吃的苦头最多。为了抢时效，我经常半夜从记者站出发，白天采访，夜里行车赶路，行驶在月下或是瓢泼大雨中。在妻子没来陪伴我的那些日子里，只有善良的房东大妈起来为我送行，在我的胸前反复划十字，为我祈祷。她为我在车上铺了一床毛毯和枕头，那是一个塞尔维亚女人对孤独的中国年轻人母亲般的温暖。我在夜路的困顿中停车睡觉，小镇教堂的钟声把我唤醒；我在黑黝黝的山中撞死路上的野生动物，迷信地预感前方可能会有某种不详。为了不使自己睡过去，也为了壮胆，我往头上浇水，大声唱歌，同自己说话。然而，正是深夜2点汽车抛锚在荒郊野岭、举目无援的时候；正是我徒步迷路在坟地般黑暗的废墟中间、惶惶不安的时候，我感到了记者职业的美，她美得让我颤抖。我相信，能在巴尔干战区的一条夜路上拥有孤独和恐怖，是多少中国年轻新闻工作者的梦想！

把这一切都写出来，献给读者和关心过我的亲人朋友，献给中国国际战地报道正在升起的黎明。

# 目 录

写在前面 .....	(1)
上 编 .....	(1)
第一章 初到前南斯拉夫 .....	(3)
第二章 第一次去波黑犯了错误 .....	(17)
第三章 拥抱萨拉热窝危机 .....	(36)
第四章 走向穆斯林控制区 .....	(54)
第五章 戈拉日代前线 .....	(75)
第六章 波黑中北部战场奇闻 .....	(84)
第七章 迎接新危机的潮头 .....	(90)
第八章 卡拉季奇和他的女儿 .....	(102)
第九章 1995年风暴 .....	(115)
第十章 遗憾与思考 .....	(130)
第十一章 我了解的波黑记者族 .....	(138)
第十二章 采访美军 .....	(158)
第十三章 “逃离”莫斯塔尔 .....	(171)
第十四章 萨拉热窝重新统一时 .....	(186)
下 编 .....	(199)
第十五章 幸运的斯洛文尼亚人 .....	(201)
第十六章 制裁中的塞尔维亚 .....	(209)

<b>第十七章</b>	两个政权并存的科索沃 .....	(223)
<b>第十八章</b>	桑甲克:大河没水小河干 .....	(241)
<b>第十九章</b>	黑山之旅 .....	(247)
<b>第二十章</b>	与世无争的茨冈人(吉普赛人) .....	(263)
<b>第二十一章</b>	告别在皮林马其顿 .....	(275)

上

编

## 第一章

# 初到前南斯拉夫

1993年3月27日晚上,我经罗马尼亚乘火车前往制裁中的南斯拉夫。离开布加勒斯特时,天下着雨。但清晨在火车上醒来,窗外雪花纷舞。列车在罗马尼亚边境不远的蒂米什瓦拉停下来,我猛然想起,1989年罗马尼亚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的“革命”,就是突发于这里。当时南斯拉夫通讯社借助地缘优势,对蒂米什瓦拉事变做了全世界新闻传媒的独家报道,占尽风流,世界各大通讯社都在数日内被迫转引南通社播发的消息。谁知,历史竟在巴尔干开了这样的玩笑:罗马尼亚在政权更迭后很快趋于平静,南斯拉夫人隔岸观火后不久,他们自己的国家却在震撼世界的战火中分割、重塑。

贝尔格莱德火车站有100多年的历史,外呈黄色,内部破旧不堪。在欧洲许多大城市里,火车站都是最破的地方。雪还在继续下,贝尔格莱德像它的名子本身“白城”一样洁白。来接我的是即将离任的人民日报老资格记者严正,我们从未见过面,他50多岁,满头白发。由于同车有中国外交官,来接站的还有中国驻南使馆的温参赞,他也是50出头,同样白发苍苍。在老严送我“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进得山来捉虎才想起也可能被老虎吃掉的怦怦心跳;我能驾驭得了这个北方晚上冷的时候下雨,南方白天暖和的时候下雪,隔着河看对岸着火,心想火烧不过来,谁知突然来了雷阵雨,对

面的火浇灭了，自家房子却遭雷霹着起火来的巴尔干吗？刚过 50 岁的“老南斯拉夫”们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而我又算什么呢？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学的都是俄语，只是在出国前，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买来一套塞尔维亚语课本，请一位一年级的塞语小姐给我讲了两个小时的语音。此外，我不会开车，也不会使用电脑。我从国内带来一部 386 笔记本电脑，同时带来一本 WPS 软件说明书和一本 DOS 使用大全，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尽管我在国内曾给杂志写过万字的前南战争专文，但是那天，我还是觉着自己像一个赤手空拳走进都市的流民。

1993 年春天，前南战争的主战场已从克罗地亚转向波黑，波黑战争经过整整一年的初期混乱后，和平进程于年初在日内瓦启动。我到贝尔格莱德不久，波黑塞族议会拒绝了国际社会提出的第一个一揽子和平计划，即有名的万斯—欧文计划。这个计划把波黑划分为 10 个民族省，割断了波黑东西部塞尔维亚省份之间的战略通道，把它们变成了没有扁担的挑子。不断往贝尔格莱德跑的欧文勋爵最后作出有限的让步，同意那条通道辟为联合国保护的中立区，“租”给塞族一根扁担，但塞族仍固执地拒绝了它。那些日子，贝尔格莱德的气氛非常紧张，外交界不时传出北约有可能空袭南斯拉夫的流言。

贝尔格莱德有个历史上形成的富人区，名叫代德尼亚。那个区最著名的街道叫乌日策街，乌日策是塞尔维亚西南部当年铁托游击队的“瑞金”。革命胜利后铁托的官邸就在这条街上，现在它成了冷冷清清的铁托纪念馆。塞尔维亚现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官邸也在这条街上，与中国大使官邸很近。这条街上还有一个院子，是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办事处，4 月份卡拉季奇与国际调解人的一系列谈判都在这里举行。当时，南斯拉夫新闻传媒对卡拉季奇还是完全开放的，他那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几乎每天都出现

在贝尔格莱德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在我的塞尔维亚语稍微过关后,我开始往乌日策街跑,谈判的热闹劲儿虽已过去,但我在那里接触到除卡拉季奇以外的几乎全部波黑塞族领导人,包括塞族外长布哈、副总统科列维奇(卡拉季奇大学时代的好友)、女副总统普拉夫希奇(有名的“铁娘子”,代顿协议后她接替卡拉季奇成为波黑塞族代总统)等。在这些人中,布哈和科列维奇当时被看成塞族的温和派,看上去温文尔雅,前一个头发很整齐,后一个头顶光光,曾在大学里讲莎士比亚。即使是很强硬的态度,两人也善于用温和的言辞表达,让人觉得塞族不像传说的那么粗鲁。两人的家眷都在南斯拉夫,所以,两人时常在贝尔格莱德“常驻”。我与两人的每次接触都很愉快,给他们往办事处打一个电话,无论两人谁在,都会答应立即见我。在我无法去波黑的那些日子里,乌日策街成了我了解波黑的一个宝贵窗口。可惜的是,1994年8月南斯拉夫因帕莱当局拒绝接受联络小组和平计划,对波黑塞族实施严厉的制裁,帕莱当局在乌日策街的那个办事处也被关闭,至少表面是这样。

中国人对波黑战争的了解普遍不如他们关于中东的知识。连搞新闻的人有时也以为贝尔格莱德也在打仗。所以,有的中国人来贝尔格莱德,就带上了止血的云南白药。为了读者阅读下文的方便,我想有必要用一些文字把这看上去的一团乱麻做点梳理。

1991年以来卷入前南战争的几个民族都是古斯拉夫人的后裔。斯拉夫人最早于公元6世纪侵入巴尔干,他们改变了半岛的人口构成,但他们自己也在不同的地域发生文化、心理上的改变。北方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溶入天主教文明,塞尔维亚人则成了东正教的俘虏。从14世纪开始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又带来了清真寺,巴尔干三教鼎立的格局从此定格下来。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巴尔干民族不断沿着众多河谷大规模迁徙,使得几乎所有土